

海派文学经典是海派文化传承的基础

——访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孙颢

■本报实习生 钱芝安 记者 蒋楚婷

“海派文化并不只有百乐门的风花雪月与上海滩的打打杀杀，海派文化的基础应该是在文学上。”在上海作协一间小会议室里，知名作家、上海作协副主席、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孙颢，在“与二十五部经典的上海相遇——2017~2018青年学子品读文学经典大赛”启动仪式后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再这样强调。

此次大赛，是由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发起、主办的青年评论创作比赛。大赛组委会从“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中选出二十五部经典文学作品，要求参赛选手任选一部作品精读，并据此撰写一篇具有独立见解的书评文章。“只有认真阅读了，才有资格谈得上与经典对话，继而上谈得上传承经典。”作为此次大赛的评委会主任，孙颢如是说。

读书：您对于“经典”是怎样定义的？这次大赛的二十五部经典书目的选择标准是什么？

孙颢：在我看来，经典实际上是很难界定的。我们现在只能说，如果一本书不仅在它发表的那个时代，更在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为读者所接受和喜爱，并在文学界具有相当的声誉，那么这样的作品经过时间的积淀，可以称之为某一时段的经典。我们在选择书目时，基本都是选择这样的作家、作品。我们不会用单一的尺子来衡量经典。正如鲁迅的作品是经典，与他有过争论的施蛰存的作品也是经典。只要是今天读来仍有价值和意义的作品，我们都提倡阅读和传承。

除此之外，我们选择的作家基本上都是在上海写作、生活过很长一段时间，并在此留下作品的；而作品也基本上都是他们旅居上海时所创作的。我们也想借这些经典为海派文化正名。海派文化并不只有百乐门的风花雪月与上海滩的打打杀杀，海派文化的基础应该是在文学上。现在人们谈起海派文化会更多地想起前者，这是我们所痛心的。上海是现当代文学的重镇，而这些文学经典的身上背负着传承海派文化的重任。海派文学的题材类型是非常浩瀚的，我们希望人们所认

识的海派文学不仅仅是其中某一个方面。

读书：在这二十五部经典作品中，有没有对您本人产生过特别影响的书？

孙颢：在我成长的时候，中学时代，能够看到的东西很有限，阅读鲁迅的作品最多。后来阅读的接触面拓宽了，渐渐接触到茅盾、巴金他们的作品。一直到大学读书之后，我才接触到过去认为比较另类的一些作家，例如施蛰存、许杰先生的作品。回想起来对我影响比较大的四位中国现代文学作家应该是，鲁迅、巴金、茅盾以及施蛰存。前三位不必多说，对我有比较特殊意义的作家应该是施蛰存先生。其实，在华东师范大学求学时，我只听过他的大课，印象不深。1982年，我从华师大毕业进入上海文艺出版社工作，任小说编辑。不久我就参加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选。当时可参考的资料很少，主持工作的领导就要求我们去徐家汇藏书楼大量阅读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纸和文学杂志。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个对我有着巨大影响的学习过程，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和施蛰存先生的作品“相遇”的。当时阅读，我就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因为当时的文学选本基本不选施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的编辑过程中，我向领导力荐施蛰存先生的作品。我认为施蛰存先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贡献很大，是最早把现代派创作手法圆熟引进的作家，是一位了不起的经典作家。若干年后，我任上海文学艺术奖的评委，我坚持认为，将终身成就奖颁与施蛰存先生，是上海文学艺术奖对一位被误解多年的重要作家的致敬。尽管我很少写作先锋派的实验作品，但施蛰存先生对我的影响不局限于文体上，更多的是他作品中独特的创造能力。



孙颢 徐福生摄

读书：“与二十五部经典的上海相遇——青年学子品读文学经典大赛”这次已经是第二届了，2015年举办的第一届曾产生了巨大反响。那么当初，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是怎么想到要办这样一个大赛的？

孙颢：2010年，由上海市作家协会与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主持、编纂的文学大系“海上文学百家文库”出版。这套丛书凝结了沪上诸多学者及教授数年的心血，蕴含了绝大多数上海文学的积淀和精华。然而丛书出版之后，我们发现能够真正关注和阅读这套书的人很少。而当代的大学生，除了课堂上老师布置的阅读任务之外，很少会自己课外拓展阅读这些海派文学的经典。他们读国外译介文学居多，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错误的观点，即认为十九至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水平不高。这实际上是一种有失偏颇的看法。这样的现状促使我们想推动年轻一代对于海派文学经典的阅读。鉴于大学生，乃至高中生的课业压力，不可能要求他们读太多的课外书。于是我们就着手从“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中一次挑选出二十五部经典，利用比赛的机会，集中让年轻一代去阅读、去思

考。而我们的初衷和宗旨，也仅仅是让青年学子去读这些经典。因为只有认真阅读了，才有资格谈得上与经典对话，继而上谈得上传承经典。虽然这是一个看似不怎么宏伟的目标，但我们认为，要想真正行之有效，就必须做一些具体的、实实在在的事情。

读书：对于参赛书评的评判标准是怎样的？您对于年轻人写书评有怎样的期待？

孙颢：我们大赛的终审评委之一，评论家、上海师范大学的王纪人教授对于青年创作评论文章提出过“三精”的要求，即精准、精道、精彩。我们希望看到的评论文字不是四平八稳的，而是具有青年人独特眼光的、锐气的文字。我们不要求文章的创作非常完备，我们期待的是创作的独特性。就如同小说的创作，文艺评论的创作也应该注重独特的艺术创造力。不是按照既有的、别人写惯的套路来创作，而是应该自成一统，这也是我们最看重的。我们需要的不是教学要求的那种几段论式的文章，而是能够有创新闪光点冒尖的作品。在上届参赛作品中，我们就很高兴看到了许多出色的评论文章，例如有两篇评论施蛰存先生《鸠摩罗什》的获奖作品就非常精彩，一篇是来自北师大文学院的薛义创作的《罗什的舌头》，另一篇是来自上海市市北中学沈晓晨的《真假黑白》。在这些优秀作品中，同质化的现象较少，让我们看到了青年评论的活力。

至于比赛的公平性，我们大赛的评审请到了权威资深的评论家，也请到了一批年轻的文艺评论家，他们对于评论文章的阅读是很全面的，是否为原创应该一眼就能鉴别“真伪”。另外，我们大赛还增设笔试及对话语音复试等形式来杜绝抄袭代写等现象。种种设置，都是为了确保这些选手真正正是阅读过了这些经典。

读书：为什么会选择高中至二十五周岁的青少年作为参赛对象？您觉得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读经典的现状如何？该阶段读经典又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孙颢：我们选择的，应该正好是高中到硕士的青年们所处的年龄段。他们这个群体比较年轻，而在这个年龄段创作评论文章其实就目前来说是很少能有发表的机会的。上一届颁奖典礼时，有一位学理工科专业的外地选手表示，如果没有这个比赛，他可能永远不会设想自己有一天竟会走文学批评的道路。我们举办这个比赛，也是立足于他们的成长，想为他们提供一点动力，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种新的可能。同时也是为青年评论人才库提供储备。

现在这个年龄段的青年人，读外国文学、流行文学比较多，读现当代文学的比较少。我们不是排斥外国的、流行的东西，只是希望青年人的阅读能够更加全面一点，我们想弥补当下对于现当代文学关注的短缺。刚刚落幕的上海书展的成功之处，就是在一段时间内，将全民关注的热点都集中到“书”上，让阅读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而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个比赛，能让大家有一段时间能集中关注海派文学、现当代文学。

读现当代经典，有助于这个年龄段的青年对中国近一二百年以来，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社会、文化、生活有一个真实而全面的感知。尽管文学作品是作家写作出来的景象，但当时人所写作的上海或中国要比我们现在来看当时客观得多。我觉得阅读现当代经典是认识中国、认识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另外，就创作视角来说，只阅读外国文学肯定是不够的。对于学习、训练写作的青年而言，在阅读现当代经典中能够获得不可替代的经验，从而使自己的创作更加全面。

(上接第一版)

王维成为二十世纪在西方被翻译得最多的中国诗人

二十世纪初，中美文化交流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就是中国古典诗歌与美国现代诗歌之间跨时空的对话，而美国诗人主动译介中国古典诗歌是其重要表现。中国山水诗的代表，如谢灵运、陶渊明、王维等特别受到青睐。而在中国名不见经传的唐朝诗人寒山的诗之所以能在美国流行，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美国深生态诗人斯奈德对寒山的有效译介。

美国译介中国诗歌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二十世纪的前二十年。这一阶段，庞德得到了著名东方学家费诺罗萨生前还没来得及整理的中国古典诗歌学习笔记，在1915年编辑整理出版了包括李白、王维等中国诗人的诗歌英译选

集《华夏集》，由此引领了美国诗人主动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一个高潮。

费诺罗萨在其笔记中，对山水诗人王维给予了特别关注。受费诺罗萨影响，庞德在其1915年列出的中国诗人名单中，将王维排在第八位著名诗人之列。王维的诗歌深受道家思想和禅宗生态思想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物我两忘”的理想境界，超越了自我和物质世界的二元对立，这与西方现代深生态观不谋而合。王维成为二十世纪在西方被翻译得最多的中国诗人。

美国译介中国古典诗歌的第二个阶段开始于二十世纪中期。赵毅衡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古典诗歌中传达的独特的自然观吸引了不少西方诗人的眼光。其中，斯奈德毋庸置疑是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生态诗人及深生态学者。他的成功翻译使得在本土名不见经传的寒山在美国几乎家喻户晓，而他自己也因此成为“美国的寒山”。作为深生态思想的倡导者，他从中国大乘佛教及道家思想中寻找

灵感，用以阐发他的深生态思想。而他也大量翻译了王维等中国诗人的诗歌，他对中国传统有机自然观的充分把握为他成功翻译中国古典诗歌奠定了必要基础。

要使对外推介的译本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必须有鲜明的文化自觉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为什么会对中国传统生态智慧产生兴趣呢？在二十世纪之前，中西方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的本质差异一直存在着，并且鲜明地体现在诗歌、绘画等艺术中。

上世纪初，在美国逐渐兴起的荒野情结促进了他们对崇尚天人合一的禅宗及道家自然观的理解。而1960年代西方现代生态危机在美国爆发后，不少西方生态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东方，希望能从东方传统思想中找到医治现代生态危机的良

药，由此出现明显的向“东方生态智慧”回归的倾向。对东方传统生态智慧的关注在二十世纪的西方逐渐成为了一股显流，由此推动了对道家思想与山水诗歌的主动译介。而就现当代文学作品而言，一些蕴含丰富生态价值的作品，比如《狼图腾》、朦胧派诗歌、海子、于坚的诗歌等，都被西方主动译介。这表明西方在二十世纪生态意识的增强直接影响了他们“译什么”的问题。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教授黄忠廉在《文化译出谁译？》一文中指出：“文化缺什么，才会强调什么，也才会主动译入什么。”以此观之，要使对外推介的译本获得目的语读者的认可，必须有鲜明的文化自觉，充分了解自身文化的吸引力之所在，能做到知己知彼，有的放矢，达到费孝通先生所说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臻美境界。西方在十八世纪和二十世纪对中国文化的主动译入可为我们目前“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参考。